

從農奴到教師

——西藏教育 見證新舊兩重天

◀從農奴到老師的玉熱老人，提起往事仍很感慨



年近七十歲的玉熱老人，曾經是舊西藏社會最底層的農奴。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後，她是第一批翻身農奴大學生。畢業後留校，成為西藏民族學院的教師。從底層農奴到崇高教師，她的一生就是對西藏新舊兩重天的最好見證。 本報記者 雷永剛

五十年過去，玉熱如今早已退休，但仍住在西藏民族學院。經歷了從農奴到學院領導的玉熱老人，像那個年代很多農奴一樣，說不清自己的年齡和生日。回憶起年少時的苦難，剛毅的臉上很平靜。

與千萬的農奴一樣，舊西藏時期的玉熱一家處在社會的最底層。她所出生的西藏昌都縣面達鄉巴通村非常偏僻，歸拉多土司管轄。玉熱家是「差巴戶」，也就是領主的傭人。由於沒有自家的房子和土地，小時候的玉熱只能和父母姐妹一起，住在領主家四面透氣、頂不遮雨的差房裡。沒有衣服穿、忍飢挨餓、勞動強度大，有病也沒條件看，更不要提上學讀書的事了。

窮孩子早當家

玉熱的弟弟和一個妹妹都是病死的。父親當時由於傷心過度，也隨即離開了人世。「在那個舊西藏，家中如果沒有男人就成了黑戶，成了地位更加低下、人人畏懼躲避的『女魔家庭』。」玉熱老人敘述說，「當時懷有身孕的母親也因傷心過度而過大精神壓力，而變得瘋瘋癲癲。一會要上吊、一會又跳河……」不到十歲的玉熱和年幼的姐姐只好撐起家庭的重擔。她們每天要繼續給領主支差，還要照顧母親和兩個更小的妹妹。由於不能勝任繁重的體力勞動，早出晚歸的她們總是不斷受到領主的鞭打腳踢。老人回憶起童年時代：「真是挨不完的打、受不完的罵，忍不完的飢餓。舊傷未好，新傷又添，整天傷痕累累。」

「領主管理當地的所有事務，他們經常派人來背馬草、背女人，而且處理事情的辦法也異常粗暴、簡單。」玉熱老人舉例說，當時有誰敢狀告別人偷了他的東西，作為一種判決方法，土司派來的人肯定會把雙方都捆上，用皮鞭先打被告，直到打得扛不住了，便供認自己偷了。然後再打原告，看你是否誣告，直至你打得撒謊為止。所以一般也沒人敢告狀。現在看來很可笑，但在當時大家卻是非常害怕的。

幸運踏入校門

直到1959年夏天，人民解放軍和地方工作隊來到他們家鄉，玉熱脫離了苦海。在轟轟烈烈的民主改革運動中，玉熱被選為積極分子，並作為西藏民主改革後的第一批大學生，推薦到內地學習，走進了西藏歷史上第一所高等學府——西藏工學，後來改名為西藏民族學院。

問及當時有多大年齡，玉熱老人的回答不免令記者詫異。她說，「我在舊社會生下來，由於家人沒有文化，到現在也不知道自己確切的年齡，不知道哪一天是我真正的生日。當時到地區報到時，工作人員會問我多大了，我也弄不清，就隨口說『十九了』。其實可能沒那麼大。當然也有一個顧慮，怕年齡大了，人家不讓我去上學。加之舊社會，缺吃少藥的，個子也不高。」

由於在內地城市需要記錄身份檔案資料，於是玉熱老人當時隨口說的1941年4月10日，以後便成了她檔案和身份證上的出生日期。但老人補充說：「後來經過多方了解，真正的生日可能應該是在1942年左右的樣子，差得還不算很多。」

玉熱老人告訴記者，和她一批踏進大校門的孩子都是翻身農奴，而且絕大多數是雙文盲。所謂雙文盲，就是指雖講藏語，但不會寫藏文，不會漢語文。因為舊西藏沒有上學的機會，沒有學校，女孩子則更不可能。所以說，學校能在短時間內將這些雙文盲培養成西藏新一代的幹部，現在回想起來，也真是教育的神奇功能！

「四觀五好」教育

記得一進校，對這批雙文盲的翻身農奴，學校首先進行了「四觀」教育，即人生觀、祖國觀、民族觀、宗教觀。然後是「五好」教育，包括思想好、學習好、身體好、團結好、紀律好。老師成天和同學在一起，實行「四同」，同吃、同住、同學習、同勞動。包括晚上，老師都要輪流值班，給學生蓋被子。因為剛到內地的藏族學生不太習慣，夏天時候總感覺熱得很，常常會把被子蹬開，然後到下半夜容易著涼，引起拉肚子、生病，加上蚊子還經常咬。

這些第一批來的翻身農奴們分別來自西藏的七個地區。七個地區講七種方言，相互之間雖然都講藏語，但誰也聽不懂誰的。為此，讓學員終生受益的文化啟蒙教育，就從學習漢語拼音拉開了序幕。玉熱老人說，就和學習一門外語一樣，從一句話、半句話開始，倒開了很多的笑話，如把「飛機」說成「北機」，語言前後順序顛倒等等，經常惹得臉蛋通紅。但大家都很努力，不放過一點點時間。連老師對這批學生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非常感動。

很快畢業後，滿心歡喜要回西藏的玉熱被通知留校工作。當時的她很不情願，但後來還是服從安排，成了一名老師，並最終成為西藏民族學院的黨委常委、紀委書記。

深知辦學艱辛

當老師期間，玉熱真切感受到了當年辦學的不容易。不但老師緊缺，而且很多需要教授的課程都沒有現成的理論和教材。籌備歷史系是玉熱印象最深的事情。當時由於西藏急需歷史方面的人才，所以學院將她從政治系調了過來。她回憶說，在學校的支持下，他們首先在老師中篩選，把所有歷史系畢業的或從事過歷史相關教學的都集中起來，送到西安的各大院校學習。與此同時，還組織人力到西安各大圖書館、古舊書店，從大量的歷史書籍中，查找摘錄關於西藏的歷史部分。後來出版的西藏《明清實錄藏族史料》等都是從當時開始搞起來的。她個人則既當政工書記、又當班主任、也是幹事，什麼都兼做，需要什麼就幹什麼。

「79年籌備，80年招了第一批學生。當時正好碰上哈爾濱、上海援藏教師的到來，為我們充實了一批歷史教師。多虧這個東風，否則我們是非常困難的！」玉熱老人回憶起來，自己也由衷發出感慨。



羌族女博士彭焱指導藏族學生



▲舊西藏，生活窘迫的農奴們根本沒有學習的機會



▲學員們交流學習體會

揭秘

西藏第一所高等學府

可能很少有人知道，西藏歷史上的第一所高等學府，並不在西藏，而是辦在陝西咸陽。說起這期間的因由，還得追溯到五十多年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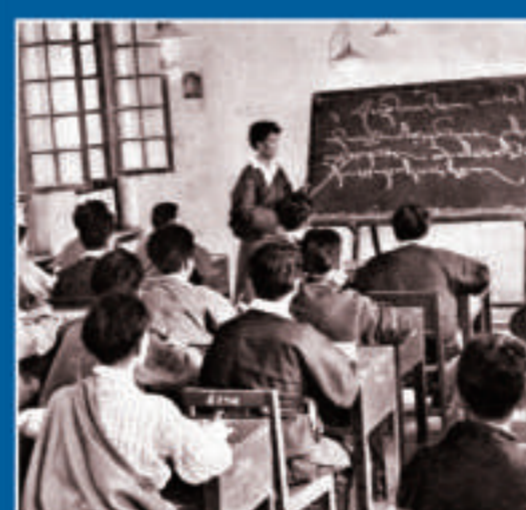
解放前的舊西藏，沒有一個現代意義上的學校。解放軍進駐西藏後，曾先後在昌都、拉薩、江孜和日喀則分別建立了一所小學。西藏初期也僅僅有這麼四所學校。

後來為了給西藏民主改革培養民族幹部，1957年3月，根據周恩來總理的指示，鄧小平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，決定西藏在內地辦學，將大批藏族青年幹部送往內地培訓。同年9月，學校定名為「西藏公學」。西藏公學的創辦使西藏有了自己的第一所大學，而且也是我國第一所、也是至今唯一一所跨異地辦學的高等學府。這在西藏的發展史上，可是破天荒的事情！

可能有人要問西藏公學——後來改名西藏民族學院，為什麼要辦在內地？玉熱告訴記者，那是因為當時的西藏百業待興，經濟狀況極端落後，而且人民政權尚未建立，政治環境十分複雜。從人力、物力、師資等各方面都沒有興辦一所大學的條件。此外，異地辦學，也可以讓這些翻身農奴子女，免受西藏反對勢力的干擾。

「自從來到西藏民族學院，我親身目睹並經歷了西藏民族學院是怎麼培養幹部的。當時學院的老師，都是來自全國各地的大學生以及十八軍中有文化的人。作為西藏的第一所高等學府，作為培養西藏幹部的搖籃，學院總是從西藏的實際和不同時期的不同需求出發來培養人才。這對老師們來說，非常不容易，需要不斷調整。」玉熱介紹說。

學院設立初期，因為需要鞏固政權，根據民主改革的需要，學院集中培養了一大批能夠充實到各個基層的政工幹部。60年代，為大力發展西藏經濟，學院又把一大批農牧子女培養成各種專業技



▲西藏公學學生在上藏語課

術人才。如今，為適應西藏對各類更高人才的需求，學院已發展成為擁有6個碩士培養點、10個學科門類和31個本科專業的現代化高等學府。

雖然遠離西藏，但西藏民族學院與西藏的聯繫很緊密。學院會經常派老師去西藏進行社會實踐、課題調研，還要對畢業生進行跟蹤調查等等。據統計，西藏三分之一的黨政領導幹部、近半數的地廳級領導，以及文化、教育、衛生、科技戰線相當一批學科帶頭人，都出自這所學校，其中包括巴桑、丹增、拉巴平措、才旦卓瑪等等。



▲外籍教師授課

藏族年輕大學生 沐浴陽光 深愛西藏

今年的西藏民族學院開學比較晚，直到上周一才正式上課，這是因為藏曆年公休的原因。大三學生羅布頓珠是在老家林芝過的藏曆年。他告訴記者，相對於農曆年來講，藏曆年更隆重一些，他們全家一大早便穿上了嶄新的藏袍，並按照傳統的習俗，享受團圓團聚的幸福。

和小伙子羅布頓珠不同，藏族姑娘白瑪普赤去了廣東惠州，看望在那裡讀中學的妹妹，並與惠州八中藏族班的兩百多名孩子一起吃團圓飯。白瑪普赤是西藏民族學院外語系大三年級的學生，主要學習英語。她說大四年級時，學生們可以根據自己的喜好，分別選擇教師和導遊兩個不同的專業方向，考取不同的資格證書。她個人傾向於畢業後回西藏做個導遊，這是因為西藏近幾年旅遊業發展非常迅猛。

國家為藏族學生「三包」

可能是家鄉發展很快的緣故，羅布頓珠和白瑪普赤感覺在內地學、生活，與家鄉並沒有什麼差別。雖然西藏民族學院為藏族學生開設有專門的藏餐廳，裡面有口味地道的酥油茶、藏式包子、藏麵等等，但他們還是經常與其他同學一起到大餐廳吃飯。

與藏族同伴們在一起時，他們多使用藏語交流，但卻都能講一口標準的漢語普通話，寫出的漢字也非常的秀麗。周末，與所有上大學的年輕學生一樣，女孩子會選擇在宿舍看書、聽音樂、做內務，而男孩子則更喜歡去體育場上瘋狂運動、大聲唱歌。偶爾還去周邊的西安、乾陵等地旅遊。

羅布頓珠告訴記者，家鄉早已普及了「九年義務教育」，而且國家還對他們上學實行「三包」，即包吃、包住、包學習用品。在他們村子裡，和他一般大的二十多個年輕人，十多個都考上了大學。而他的弟弟則選擇了參軍。

拉薩暴力事件深感震驚

去年「3·14」拉薩暴力事件，讓正在上學的他們非常震驚：「因為我們長這麼大，沒有經歷過這種事情。後來看了一些視頻，也意識到事情挺嚴重。作為一名大學生，特別是一名藏族大學生，自己的家鄉發生了這種事情，心裡有種說不出的感覺。」

羅布頓珠介紹說，「3·14」之前他們每次回家路過拉薩，都會在八角街的一個挺大的招待所住宿。但去年暑假回去時，招待所已經關門了，不能用了。房屋還有被燒的痕跡，東西也都被砸了。

「但通過這個事情，大家對達賴集團也有了進一步的了解。」白瑪普赤的話則更簡單明瞭，「不管誰，做任何事情，都不應該傷害到民眾的利益。因為當時在拉薩，大家都看到，很多民眾都是受難者。」事件後，一向不關心政治的她，也開始重視起這方面的新聞了。

